

唐太宗全集

校

注

吴云 冀宇 校注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古籍出版社



作者于1991年摄于陕西乾陵

吴云

1930年生，辽宁省义县人。195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，天津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。主要著作有《陶渊明论稿》《20世纪中古文学研究》《建安七子集校注》《历代骈文注析》《贾谊集校注》等23种。1993年起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

冀宇

1931年生，河北省河间县人。195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，天津解放南路中学高级教师。主要著作有《唐太宗全集校注》（与吴云合作）《汉魏六朝诗三百首注》（与吴云合作）。

唐太宗全集

校注

吴云 冀宇 校注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唐太宗全集校注/吴云，冀宇校注. — 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4.2（2015.3重印）
ISBN7-80504-971-8

I. 唐… II. ①吴… ②冀… III. ①李世民（599-649）—全集②唐太宗全集—注释 IV. Z424.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03）第032939号

唐太宗全集校注

吴云 冀宇/校注

出版人/张玮

*

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

（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）

<http://www.tjabc.net>

天津市高晶数码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22.5 插页 2 字数560000

2004年2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3次印刷

ISBN7-80504-971-8

定 价：38.00元

序

唐太宗是我国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,又是具有一定成就的诗人、文学家,是封建王朝的英明君主。在农民起义推翻隋朝的基础上,他统一全国,创建唐朝。唐太宗统治期间,国家政治稳定,经济发展,民族关系协调。贞观之治为大唐帝国的文明昌盛奠定了基础。他是汉族地区的天子,又是边疆各族的“天可汗”,他的名声远闻亚洲各国,是当时“国际”上的著名人物。

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,自他死后至今一千三百多年来,古今中外,史官、学者、各色人等,不知发表过多少评论,本书的《前言》又对他的功过给以全面的概述。在我的印象里,评介唐太宗的政治表现、经济措施、军事才能、民族政策等方面的文章很多,而关于他在文化建设和文学成就方面的评介文章则较少,甚至少得与前者不成比例。这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一方面,历史学者总是注重政治经济问题而忽略文化问题,文学史家则多半以唐太宗的文学成就不及其他著名作家而不予重视;另一方面,也由于过去人们接触的有关唐太宗的材料多半是从史书上得到的,而关于唐太宗自己的著作则接触较少或根本没有接触。这是一个缺陷。由于这一缺陷,人们对于唐太宗的认识就不够全面,即只知道唐太宗的外在表现,而对他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则不甚了了。本集的《前言》对唐太宗在文化建设和文学创作方面的业绩给以较多的评介,这对读者是很有用的。

我觉得,唐太宗在文化建设方面的贡献和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,在封建帝王中可说是独一无二。历代开国皇帝,多以马上得天下,武功可观而文治不足。秦始皇焚书坑儒,汉高祖轻侮士人,虽然他们在历史上也有一定贡献,但在文化建设方面却无可称道或负有罪责。其原因或由于厉行专制统治,实施愚民政策;或由于本人不学无术。唐太宗则不然。他半生戎马而留心经史,日理万机而注意文翰。他通经明史,能写文章,能作诗赋,还能写一笔好字,不愧是文化上的多面手。有了他的倡导,唐朝不仅成为一个经济军事大国,也是一个学术文化大国。当时东亚各国和高昌、吐蕃诸族到长安留学的,就有八千多人。真是济济洋洋,盛况空前。这说明,唐太宗不仅有恢廓的政治胸怀,卓越的军事才干,也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。这样的文化修养,使他有才有识,能统率三军,驾驭群臣,君临天下。欧阳修在《新唐书·太宗纪赞》上说:“盛哉,太宗之烈也!其除隋之乱,比迹汤、武;致治之美,庶几成、康。自古功德兼隆,自汉以来未之有也。”虽然称誉备至,但对唐太宗的文化修养和成就方面,依然未着一字,使人感到欠缺。

本书弥补了这一欠缺。读者可以看到唐太宗亲自撰写的诗赋和文章;读他的诏令(可能由文士代笔但经他修订同意),可以知道他怎样处理国计民生大事;读他的史论,可以知道他怎样评价古人;读他的《帝范》,可以看出他的政治见解……而读他的诗赋,更可以了解他的思想情操,窥见他的内心世界。这样,对唐太宗的认识就比较全面和深刻了。单凭史书的记载了解唐太宗,总是间接的、片面的,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;而读他本人的著作,则是直接的、比较全面的,所谓如闻其声,如见其人,备感亲切。它不仅为史学家做第一手资料用,也可供古典文学研究者阅读欣赏和做文学史资料用。

唐太宗的诗文散在各书,明代刊刻的《唐太宗皇帝集》很不完

备。此次吴云和夫人冀宇同志积数年之力,广搜博寻,终于整理出比较完整的集子。其工作之艰巨,用力之勤奋,可以想见。在本书中有校勘,有解题,有注释,有系年,有标点,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。他们的注释很详尽,更可贵的是,对于不易理解的词句,径书“未详”,既不强作解人,也不回避矛盾,不予标出。这种“不知为不知”的实事求是的作风,是应该提倡和赞扬的。

我很高兴这部文集的出版。我相信,它一定会推动学术界对于唐太宗的深入研究,有助于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,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。故乐而为之序。

杨志玖

1983年4月20日

再 版 序

唐太宗是封建帝王中最杰出的帝王之一。他在位期间(626—649年),国家统一,政治清明,社会安定,人口增加,经济恢复发展。他的年号贞观,史称“贞观之治”。此外,他的诗文赋写得比较好,历代论述唐太宗的文章较多。改革开放后出版了有关唐太宗的评传亦有数部,而关于他的著作,始终未得到应有的重视。明代《唐五十家诗集》中的《唐太宗皇帝集》,仅选诗六十首,赋三篇,其字数远不及今存唐太宗诗文的十分之一。20世纪70年代末,吴云、冀宇二人合作,对唐太宗的著作进行编辑、题解、校勘、注释(诏令公文未注)、系年,并于1986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,名为《唐太宗集》。该书出版后,《博览群书》1987年12期以“第一部唐太宗集”为名加以评述,并给以很高的评价。1987年《唐太宗集》荣获第二届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一等奖。当时该书不仅在中国内地、台、港地区受到欢迎,还引起了日本、美国等国学者的重视。尽管《唐太宗集》的出版,获得了多方面的好评,但是吴云、冀宇却并未因此而止步,他们深感此书尚有不完备之处。于是他们对诏令公文部分,在原有题解、校勘、系年的基础上,增加了注释;原来诗文缺系年的,进行考证后加上系年。特别是在辑佚方面,下了大力气,他们遍翻了有关唐太宗的书籍,并参考了地下考古发掘报告,又用了十余年的时光,在原《唐太宗集》的基础上,增加了二百余篇(条)。前人说“十年磨一剑”,而吴云、冀宇夫妇,却用二十年的时光整理出

《唐太宗全集校注》，在这人心浮动的商品大潮时代，他们的为学术事业甘心坐冷板凳的精神，是值得肯定的。总之，《唐太宗全集校注》的出版，不仅填补了古籍整理的一项重大空白，而且对研究唐代历史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文学、书法等方面，都是颇为有益处的。

是为序。

朱-玄

2003年1月10日于南开大学

北村寓所，时年92岁

前 言

唐太宗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，他在文化建设方面也有不可泯灭的功绩。

唐太宗的英雄业绩首先表现在为统一大业而进行的战争方面。隋炀帝是著名的暴君。他即位后，大兴土木，营建东都洛阳，继而开掘运河，修筑长城，开辟驰道。尤其是在他晚年时，屡次发重兵侵略高丽。全国各地人民忍受不了此种残酷的剥削和繁重的徭役和兵役，纷纷举行起义反隋。这时，统治阶级内部开始分化，各地的地主、富豪乘机割地称雄。李世民的父亲李渊于大业十二年（616年）任太原留守，18岁的李世民看到起兵反隋的时机已经成熟，便于大业十三年（617年）果断地杀了隋炀帝的亲信、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，揭起了反隋的义旗，从此开始了他的战争生涯。唐王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，曾有过三次较大的战争，而这些战争的全胜，都是在李世民亲自指挥下取得的。

首战陇右的薛举、薛仁果父子，是李世民第一次指挥的大规模战争。大业十三年（617年）金城郡富豪薛举据郡起兵，称“秦帝”，都兰州，后又迁都天水，占据了陇西全境，拥兵三十万。武德元年（618年）七月，唐军与秦军交锋于高墟（今陕西长武县北）。李世民由于轻敌和急躁而败北，秦军乘胜向唐境进攻。不久，举死，其子仁果继立。

薛仁果据折墌城(今甘肃泾川县东北),继续进攻唐军。李世民总结了前次失败的教训,始则坚壁不出,待秦军粮尽人疲时方大举出击,薛仁果被迫出降。

唐军遇到的另一个劲敌是刘武周。他占据了雁门、楼烦、定襄等郡称帝。武德二年(619年)曾击败唐军,李元吉弃太原归长安。这时李渊慌了手脚,想要放弃黄河以东的土地,专守蒲津关以西,从而保卫关中。在此关键时刻,李世民挺身而出,向李渊呈表说:“太原王业所基,国之根本,河东殷实,京邑所资。若举而弃之,臣窃愤恨。愿假精兵三万,必能平殄武周,克复汾、晋。”(《旧唐书·太宗本纪上》)李渊接受了他的意见,派他进讨刘武周。李世民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,指出敌方“士卒虽众,内实空虚,意在速战。我坚营蓄锐,以挫其锋,粮尽计穷,自当遁走”(同上)。当敌人力疲之后,经过几番较量,于武德三年(620年)大败刘武周,武周逃突厥,唐军收复了并州。

李世民碰到的最大的劲敌是王世充与窦建德。王世充乃隋末东都守将。炀帝死后,王世充成了河南最强大的割据势力。武德二年(619年)四月,他自立为帝,国号郑。武德三年(620年)七月,李世民率军进击王世充。他为了打好这场攻坚战,对王世充采取了先行包围的战术,然后再采用政治攻势,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。王世充被围困在洛阳,数次向河北的另一割据势力窦建德求救。此时窦建德已自称皇帝,国号夏,他曾南下破黎阳,致使李神通、同安公主、魏徵、李世勣等都被俘获,他更加骄傲起来。当时他预感到,倘若王世充被唐军击败,他的地位将会随之不稳。为此,他率十余万众支援王世充。李世民命李元吉领兵围困洛阳,自己“亲率步骑三千五百人趣武牢”(同上),以此来扼止窦建德军的西进。李世民的著名的《报窦建德书》就是这时写的。信中讲明利害,劝阻窦建德不要援救

王世充,但是,窦建德仍固执己见。二十余日后,李世民见“建德列阵,自辰至午,兵士饥倦,皆坐列,又争饮水,逡巡敛退”,乃下令全面出击,“生擒建德于阵”。李世民回师至洛阳城下,王世充眼见大势已去,遂“率其官属二千余人诣军门”投降。李世民一战消灭了夏、郑两个封建割据集团,使黄河南北地区均为唐所占有,至此,唐王朝的统一大业基本完成。以后虽然还有与刘黑闥等的战争,但其规模较小,不能与前三次大战相比拟。

李世民在三次大规模的战争中之所以能取胜,其主观原因有三。

其一,敢于胜利是李世民在战争中取胜的最主要的原因。李世民所遇到的薛举、薛仁果父子,刘武周和王世充、窦建德,其兵力都是强大的。年轻的李世民在强敌面前有信心打败他们,从而使战争获胜。

其二,善于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,调查和掌握敌方情况。不论在战前,在战争相持阶段,或主力交锋之际,抑敌人溃退之时,他总要亲自深入或靠近敌方营垒,侦察敌方动态,进行认真分析,做到“知彼知己”,以己之长——持雄厚的战斗力,集中打击敌方的弱点。

其三,能采纳正确的建议。当形势十分复杂急迫时,特别是自己一方处于不利地位时,他能广开言路,然后加以权衡,采纳其中正确的建议。

二

唐太宗的英雄业绩,主要表现在治国方面。他29岁即帝位,做了二十三年皇帝。在他执政期间,史称“贞观之治”。综观他的治国之术,在政治、经济等方面,有如下几个特点:

一、举贤任能。唐太宗明确地认识到,“国之匡辅,必待忠良,任

使得其人,天下自治”(《帝范·求贤篇》)。为此,他即位后,仅公开颁布求贤的诏书便有《令河北淮南诸州举人诏》、《荐举贤能诏》、《令天下诸州举人手诏》、《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》、《令州县举孝廉茂才诏》等篇,至于平时与辅弼之臣在谈话中要求推举贤才的,更是数不胜数。他确实做到了任人惟贤,任人惟才,而不是任人惟亲。瓦岗寨起义军中的李勣、程知节、秦叔宝等人,他也一一委以重任。曾经参加过起义军,后归唐给李建成出谋划策的魏徵,在“玄武门之变”后,也被委以重任。唐太宗的以求贤来治国的方针,终生不变。贞观十八年时,他已到了晚年,但他对各地推举上来的人均亲自策问。被策问的人,多为庸才,“莫能对扬,相顾结舌”;太宗考虑到可能是由于在朝廷上过于紧张之故,因而改口试为答卷(“墨对”)。其结果往往是“虽构思弥日,终不达问旨,理既乖违,词亦庸陋”(《荐举贤能诏》)。此事足以说明太宗的求贤若渴的心情,也说明有才学者多被他所任用,剩下的人才而未被录用者,则不多了。

二、善于纳谏。为了使唐王朝巩固,唐太宗经常启发臣下多提意见,以匡正“为君之蔽”。贞观三年大旱,他在《祈雨求直言诏》中明确提出:“文武百辟,宜各上封事,极言朕过,勿有所隐。”贞观十一年又颁布《大水求直言诏》。贞观二十一年又颁布《求直言手诏》,指出提意见的人太少了,还说:“惟昔魏徵,每显余过。自其逝也,虽有莫彰,岂可独非于往时,而皆是于兹日。”他深切感到自己有过失,就是提意见的人太少。他还深刻地理解“纳谏”的重要性。他在晚年写给太子李治的《帝范》中,把纳谏单独列为一篇,总结出:一个明君治国有成绩,能够纳谏是重要的因素;昏主的“身亡国灭”常常是由于拒绝采纳忠臣的进谏。他以此教育李治,当皇帝之后,要时刻想着多听取意见。正因为唐太宗对纳谏的重视,使得他善于听取意见,真正做到了“闻过则喜”。在我国的封建社会中,贞观时期君臣

的纳谏和直谏被传为美谈。

三、轻徭薄赋。唐太宗对爱惜民力是十分重视的。贞观元年七月,他便颁布了《缓力役诏》。诏中要求“每有丁匠之所,常申戒作之司,令其宽大工程,务从闲逸”,一切从节俭出发。必不得已须用民力处,“须慰彼民心”。唐朝初年,关东、关中各地连续发生水旱霜蝗之灾,唐太宗很重视救灾工作。仅贞观元年至三年,有关救灾的诏令就有《赈关东等州诏》、《旱蝗大赦诏》、《遣使巡省天下诏》等篇。在这些诏令中,太宗命令灾区官属开仓赈济,并委派中央重要官吏分赴各灾区巡视。邓州刺史陈君宾救灾工作有成绩,他所管辖的州做到了“逐粮户到,递相安养,回还之日,各有赢粮,乃别赍布帛,以申赠遗”(《劳邓州刺史陈君宾诏》)。为此,太宗特颁布诏书以资褒扬,“并令考司,录为功最”。由于唐太宗轻徭薄赋,重视救灾,因而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生活,“使比屋之人,恣其耕稼”(《贞观政要》卷八《论务农》),这就使得农民逐渐富裕起来。

四、减轻刑罚。唐太宗重视“轻刑”的措施。贞观元年,太宗对群臣说:“死者不可以再生,用法务在宽简。”(《贞观政要》卷八)又指示臣下:“大辟罪,皆令中书、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。”(同上)对死刑的判决如此慎重,自可减少许多冤案。为了进一步减轻刑罚,他于贞观十一年正月十四日颁行了新修订的“新律”,比隋朝旧律减“大辟者九十二条,减流入徙者七十一条”(《唐会要》卷三十九)。其他诸如变重刑为轻刑的还有很多。此外,明显地表现出唐太宗减轻刑罚的是他即位之后的几次大赦。其中有:武德九年八月《即位大赦诏》,贞观四年二月《大赦诏》,贞观九年三月《水潦大赦诏》,贞观十七年三月《久旱简刑诏》等。通过一系列的减刑措施,犯罪的人数有逐步减少的趋势。

五、移风易俗,反浇还淳。唐太宗鉴于隋朝的颓风弊俗,刚即位

便颁布《谕崇笃实诏》以倡导移风易俗。诏令中明确规定：“自今以后，内外官人，须相存问，勿致疑阻。有遇疾疾，递加询问，为营医疗，知其增损。不幸物故，乃遭忧恤，随事慰省，以神情好，务从笃实，各存周厚。”在《劳邓州刺史陈君宾诏》一文中，太宗认为邓州的百姓在天灾面前能互相救助，这就可以“变浇薄之风，敦仁慈之俗”。在倡导反浇还淳的社会风气的同时，太宗还极力提倡节俭。贞观元年，太宗“欲造一殿，材木已具，远想秦皇之事，遂不复作”（《贞观政要》卷六）。在历史上，秦始皇等封建帝王为了大修陵墓，不惜劳民伤财；唐太宗却与之相反，主张薄葬。为此，他早在贞观十一年便颁布了《九峻山卜陵诏》，为身后的薄葬做了安排：“于九峻之山，足容一棺。”他指出，这样做，一方面有利于社会风俗“反浇蔽于淳朴”，另一方面，可以避免其子孙后代“尚习流俗，犹循常礼，加四重之椁，伐百祀之木，劳扰百姓，崇厚园陵”（同上）。身为帝王的唐太宗，大力倡导移风易俗，崇尚节俭，对社会风气“反浇还淳”起了积极促进作用。

六、关怀出生之地和创业基地的父老。唐太宗生于关陇，创业的基地主要也在关陇地区。贞观四年十月初，唐太宗回到出生之地武功地区，睹物生情，遂《颁赦岐陇二州诏》。诏文中规定“二州户民，无出一年租”，八十以上的老人另有赐物。贞观十五年六月，他写了《存问并州父老玺书》。信中高度评价了并州父老对当年义兵所做的贡献。文末有“夏序甚热，想各平安，善自颐养，动静奏闻”十六字，反映出他对故土父老的关怀之情，甚为感人。贞观二十年正月，他颁布了《征辽还宴赐父老诏》。诏中说：“既因垂拱之暇，再省创业之方，周历郊原，宛如畴昔，访其故老，已多长谢。”可见从起兵之后，他不止这一次回太原，由文中有“再省”二字可证。一个封建帝王在平定天下之后衣锦荣归，回一次故乡，设宴作诗如刘邦，这不难；难在终生不忘创业基地的父老，关怀他们的生活，不忘他们在打

天下时所做出的贡献。唐太宗在这一点上,也胜过了历代的许多创业的帝王。

七、善于与功臣相始终。在封建帝王中,善于与功臣相始终的,当首推唐太宗。贞观十二年,他颁发诏令,命将长孙无忌、杜如晦、魏徵等二十四位开国功臣画像于凌烟阁,用以表彰其勋德,使之“永贻于后昆”。为了使年老多病的功臣能继续发挥作用,唐太宗还设置了“散官”以备顾问。高士廉、尉迟敬德任开府仪同三司,李靖、萧瑀、魏徵任特进,唐俭、李勣任光禄大夫。与唐太宗共患难打天下和治天下的文武功臣,在老年时任散官的很多,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唐太宗对因年老、患病而辞职的功臣,明令规定“内外文武群臣年高致仕,抗表去职者,参朝之日,宜在现任品之上”。为了优待功臣,还表现在赐葬地上。他决定:“令所司,于昭陵南左右厢,封境取地,仍即标志疆域,拟为葬所,以赐功臣。其有父祖陪陵,子孙欲来从葬者,亦宜听允。”(《赐功臣葬地诏》)功臣生前受到优抚,死后还可以葬在帝王的陵墓两侧,如此善于与功臣相始终者,在封建帝王中是极罕见的。

八、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。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与秦始皇、汉武帝有所不同。秦始皇击败了匈奴,还要修筑长城以防其南侵;汉武帝大举用兵,穷追猛打;唐太宗则主要采用了历史上称之为“羁縻”的政策,它不改变被征服民族的生产方式、风俗习惯,任命他们的贵族做羁縻州府的都督刺史,继续直接统治本民族。让各少数民族与唐中央保持着隶属关系,又可按他们的传统方式处理族内事务,有较多的“自治权”。为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,对于闾、龟兹等地,仍保留“国王”的称号;对突厥、回纥的首领仍称“可汗”、“俟斤”。为了缓和唐王朝与各少数民族间的关系,唐太宗还采取了“和亲”的政策。唐先后曾与吐谷浑、吐蕃等和亲,这就使得民族关系得到改善。

唐太宗的民族政策的核心是与民休息,尽量减少各少数民族的武力反抗,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上,这种民族政策是有进步意义的。

三

唐太宗的英雄业绩还体现在他的文化建设和文学创作方面。太宗虽然是凭武力取得了天下,但对文化建设也极为重视。他深知“虽以武定天下,终当以文德绥海内;文武之道各随其时”(《旧唐书·音乐志》)。武德四年(621年)刚打败王世充、窦建德,他就颁布了《置文馆学士教》,在长安设置了文学馆,招引杜如晦、房玄龄、许敬宗等18人兼任“文馆学士”,请他们“引礼度而成典则,畅文辞而咏风雅”。

唐太宗对史书的修撰非常重视。贞观三年(629年)“移史馆于门下省北,宰相监修”。“及大明宫成,置史馆于门下省之内”(《唐会要》卷六十三)。置史馆于禁中,以便于亲自主持史书的修撰。贞观十年(636年),魏徵、姚思廉、李百药、孔颖达、令狐德棻、岑文本、许敬宗等“撰成周、隋、梁、陈、齐五代史”,呈太宗,太宗对上述修撰史书人员分别给以赏赐。贞观二十年(646年)太宗颁发了《修晋书诏》,诏文中规定了撰写《晋书》时应“铨次旧闻,裁成义类,俾夫湮落之诰,咸成发明。其所须可依五代史故事”。为了使《晋书》更加完备,太宗亲自动笔写了《晋宣帝论》、《晋武帝论》、《陆机论》、《王羲之论》等四篇史论。

在主持修撰史书的同时,太宗对搜购、整理和保存古籍方面也很重视。他深感“经籍去圣久远,文字讹谬”,于是“令师古(颜师古)于秘书省考订《五经》”。经数年努力,颜师古对古籍中的讹误“多所厘正”(《旧唐书·颜师古传》)。贞观七年(633年)拜颜师古为秘书监,“专典刊正,所有奇书难字,众所共惑者,随疑剖析,典尽其源”。不久,又命“师古注班固《汉书》”。太宗主持的整理古籍,主要是校勘